



国 家 文 明

国家与文明

第一辑

主编 李禹阶 常云平



国家与文明

| 第一辑 |



主编 李禹阶 常云平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结合的方法，从多种维度与不同视野，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治理和文明发展进程。在对古代中国国家起源与治理研究中，从国家是阶级压迫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出发，既探究了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巡狩”制度、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五方之民”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等内容；又对于王制末代和帝制早期的汉代游侠、汉晋河西与岷江上游“羌胡”等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文明发展进程研究中，则对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之科学性考释、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

该书对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可供历史学、考古学及文史研究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文明. 第一辑/李禹阶, 常云平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3-053435-4

I. ①国… II. ①李… ②常…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5565 号

责任编辑：陈亮 杨静 范鹏伟 / 责任校对：杜子昂

责任印制：张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联系电话：010-64011510

电子邮箱：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光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B5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2

字数：390 000

定价：10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与文明》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李禹阶

副主任 常云平 刘俊男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晓 向中银 刘耀辉 汪 荣 武仙竹

赵昆生 袁艳玲 蒋 刚 喻学忠

主编 李禹阶 常云平

《国家与文明》发刊词

从人类社会历史看，文明与国家总是在互动中不断演进、发展。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 Civis，意指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及其社会生活，引申则泛指人类脱离原始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要素，诸如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礼仪、信仰、政治与宗教观念，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等。正是这些文明诸要素构成了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社会生活。而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称谓的中国，其礼仪文明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以往的社会历史更是起到了深远影响。在古代中国，“文明”一词往往作为社会演进、文化进步的标志与内涵。《易·乾·文言》有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则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对上两句则分别疏曰：“天下文明者，……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它说明，在古代中国，文明既是指人类的浚哲，亦是指社会的进化、章华、光明，尤其是作为古代中国文化主线的礼仪文化，更是与“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相联系。

正是在不同文明的生存土壤与演化模式中，形成了不同演进道路的国家形态。如果说古代希腊、罗马国家是地中海海洋文明的赐予；那么在中国，其国家的产生、发展则与其生存繁衍的黄土地内陆文明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大片黄色土地上，咆哮的黄河，奔腾的长江，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在孳生伟大、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在史前的久远、旷古的时代，形成了最早的华夏国家。而在这文明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其内在精神都贯穿着华夏“礼仪”这一精髓。不论是在文明的演进中，还是在国家的整合、社会的发展中，它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使古代中国的文明与国家在互动中不断前行。

在古代中国，在物质层面、精神（宗教）层面、制度层面，文明与国家总是形影不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明环境及构成模式，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及制度层

面的内容。同样，国家所主导的精神与制度层面也制约了文明演进的方向。由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与稳定的工具，同时亦是一个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或者抑制的力量。所以，当文明土壤规范了早期国家的发展道路时，而不断发展的古代国家也在其自身演进逻辑中制约着文明的方向。尤其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从精神（宗教）层面、制度层面对文明前行路径的规制作用则日益突出。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一方面，文明模式制约了古代中国国家的起源及其演进方向；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政治国家在从史前的酋邦、古国，到夏商周三代的诸侯分封制国家，直至秦汉及其后的帝制国家，也都在通过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制约、规范着文明进步的历程。这种文明与国家的互动性，是我们探讨与研究古老中华文明与华夏国家的一个基点。通过这个基点，我们可以从物质层面、精神（宗教）层面、制度层面，包括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规制与等级、社会精神与风俗等多方面展示古代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涵与特点，由此推进中国历史、文化探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正是基于此，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创办了这个以“国家与文明”为主要探讨内容的集刊，目的是和学术界同仁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文明进程与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在该刊创办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对此颇有研究的学者、师友的帮助、支持，在此表示最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殷切期望该刊能够得到学术界各位学者、朋友，以及有志于此探讨的青年才俊的大力支持。

最后，我们也衷心希望：伴随 2017 年初春的脚步，通过该集刊的出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柳梢初绿的季节，感到新春的丝丝喧意。

目 录

上编 中国古代国家研究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王子今/3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王震中/17
“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黎小龙 徐难于/34
春秋战国之际的动荡格局与权力更迭	苏 辉/42
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治理思想及“法”理念 ——兼论先秦法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	李禹阶/47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	杨振红/73
三次刺杀行为对秦始皇地域政策失误的影响	孙家洲/101
汉代游侠：行走在王制末代和帝制的早期时代	彭 卫/109
汉晋时代河西与岷江上游的“羌胡”辨析	霍 巍/133
王安石与孟子 ——孟子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	李华瑞/142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张明富/157

下编 古代文明进程研究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蓝 勇/179
三星堆青铜神树与西南“天梯”神话	邹美都/198
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之科学性考释	
——兼论幕阜山地区为上古天象观测中心	刘俊男/207
夏商西周文化对其西方、北方地区文化渗透的方向性和层级性	蒋 刚/226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孔令远/245
巴文化西播与楚文化西渐	白九江/272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 《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	邬文玲/283
冯时行易学佚文简论	张 文 李娟娟/298
夔路策应使考	喻学忠/310

上 编

中国古代国家研究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

炎帝有“连山氏”称号，早期易学亦有称作《连山》或《连山易》的文献，其相互的关联值得重视。通过“连山”之“连”的字义分析，可以推进对早期交通的认识。轩辕名号与交通有关，轩辕神话也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反映交通行为与早期国家形成之关系的宝贵信息。“巡狩”故事，可以看作体现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之关系的历史记忆。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巡”“行”“游”，有人以“古者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然存留信息有限，但是对于说明交通进步之历史的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将证明交通条件对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将不断充实并更新我们对早期交通史与早期文明史进程的认识。

一、炎黄交通实践

炎帝有“连山氏”称号。《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炎帝“又曰‘连山氏’。”^①早期易学亦有称作《连

*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页。

山》或《连山易》的文献。^①人们自然会考虑到将“又曰‘连山氏’”的炎帝与《连山》一书的著作权联系起来。

有学者指出“连”和“联”可以通假。如《周礼·天官·太宰》：“三曰官联。”郑玄注：“郑司农云：‘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②这样说来，所谓“连山”名号的含义，似可理解为与经历山地交通实践时心理感受的历史记忆有某种关系。

“连山”的“连”字，其实原本就有与交通相关的意义。《说文·辵部》：“连，负连也。”段玉裁以为“负连”应正之为“负车”，以为“‘连’即古文‘輶’也”，则“连”字与交通方式和交通行为相关之古义得以揭示。我们看到汉代画像中连续挽车的形式，有助于对“负车”的理解。段玉裁还解释说：“《周礼·乡师》‘輶輶’，故书‘輶’作‘连’。大郑读为‘輶’。‘巾车连车’，本亦作‘輶车’。”^③指出“连”与“輶”的关系的，还有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其中凡举四例，除《周礼·地官·乡师》“正治其徒役与其輶輶”，郑玄注：“故书‘輶’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輶’”之外，又有三例：

- (1) 《周礼·春官·巾车》：“輶车组挽。”《释文》：“‘輶’本作‘连’。”
- (2) 《战国策·赵策四》：“老妇恃輶而行。”汉帛书本“輶”作“连”。
- (3) 《庄子·让王》：“民相连而从之。”《释文》：“司马云：‘连读曰輶。’”^④

“连”字“从辵车”，《说文》归于《车部》。段玉裁说：“‘联’‘连’为古今字，‘连’‘輶’为古今字，假‘连’为‘联’，乃专用‘輶’为‘连’。大郑当云‘连’今之‘輶’字，而云读为‘輶’者，以今字易古字，令学者易晓也。许不于《车部》曰‘连’古文‘輶’，而入之于《辵部》者，小篆‘连’与‘輶’殊用。故云‘联，连也’者，今义也；云‘连，负车也’者，古义也。”^⑤所谓“‘连，负车也’者，古义也”，使人联想到“连山”名号出现的时代，人们很可能频繁经历着艰苦的交通实践。

炎帝曾经历长途远行，对于这种交通实践的历史记忆在上古文献中有所保留。如屈原《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直驰”句，王逸注：“将候祝融，以谘谋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对于“南疑”句，王逸解释：“过衡山而观九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就“三兆”“三梦”各有讨论，他说：“所谓三兆之法，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是三种卜法的占书，是有道理的。”“三梦之法，可能也是三种梦占的书。”“三易”，则是《连山》《归藏》《周易》。李学勤说：“《连山》《归藏》《周易》，和三兆、三梦一样，是三种不同的占书。”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30—37页；《周易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40—47页。

^②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12页。

^③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④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12页。

^⑤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疑也。”^①所谓“指炎神而直驰兮”，一作“指炎帝而直驰兮”。^②屈原笔下“炎帝”或者“炎神”、“直驰”，“往乎南疑”而“览方外之荒忽”，正是远古先王交通行为的文化映象。^③

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所谓“轩辕”得名缘由，一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④；一说“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⑤

“轩辕”，其实原义是指高上的车辕。《说文·车部》：“轘，辀也。”“辀，轘也。”“軒，曲辀藩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轘。”“于藩车上必云曲辀者，以辀弯曲而上，而后得言軒。凡軒举之义，引申于此。曲辀所谓‘轩辕’也。”^⑥以“曲辀”解释“轩辕”，正符合早期高等级车辆“曲辀”形制的考古学知识。

“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辕”被用来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在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文选》卷一班固《东都赋》写道：“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舟舆”等交通工具的创造，被看作“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的重要条件。交通事业的成就，也被理解为帝业的基础。李善注引《周易》曰：“黄帝、尧、舜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⑦，也将交通工具的发明权归于黄帝等先古圣王。

传为屈原所作《楚辞·远游》中，可见“轩辕不可攀援兮”句，王逸在注文中也有比较明确的解释：“黄帝以往，难引攀也。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⑧可见，“作舟舆”，“作车服”，很可能是黄帝得名“轩辕氏”的主要原因。

黄帝传说往往与“雷”的神话有关。例如，所谓“黄帝以雷精起”^⑨，“轩辕，主

^① 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页。

^②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一、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子今：《神农“连山”名义推索》，《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④ 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页。

^⑤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邹诞生音云：‘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⑥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20、725页。

^⑦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页。

^⑧ 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

^⑨ 《艺文类聚》卷二引《河图帝纪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34页。

雷雨之神也”^①，“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②等说法，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淮南子·览冥训》说，先古圣王“乘雷车”^③，《淮南子·原道训》又说：“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④，雷声，正是宏大车队隆隆轮声的象征。司马相如《上林赋》：“车骑雷起，隐天动地”^⑤，又张衡《周天大象赋》：“车府息雷轂之声”^⑥，以及《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和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雷輶”^⑦，焦氏《易林》所谓“雷车”^⑧等，同样也可以看作例证。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⑨所谓“监于万国”“万国和”的局面的形成，有“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归轩辕”“合符釜山”等交通活动以为条件。而“轩辕”“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的交通实践，当然也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最重要的基础。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程十分遥远，他曾经东行至于海滨，登丸山与泰山；又西行至于空桐山，登鸡头山；又南行至于长江，登熊山、湘山；又向北方用兵，驱逐游牧部族荤粥的势力。非常的交通经历，成为体现执政能力的优越资质。

① 《太平御览》卷五引《春秋合诚图》，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页。

② 《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页。《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轩辕，黄龙体。”张守节《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

③ 箕释：“陶方琦云：‘《御览》九百三十引正文作‘乘云车’，引许注作‘云雷之车’。’”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8、689页。

④ 高注：“雷，转气也，故以为车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8页。

⑤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33页。

⑥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四《张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6页。《北堂书钞》卷一一七引班固《封燕然山铭》，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446页。

⑧ 如《焦氏易林》卷三《否·困》：“白日阳光，雷车避藏。云雨不行，各自止乡。”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第83页。

⑨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

张衡《思玄赋》写道：“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所谓“超轩辕”，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宏远的理想。李善注：“《海外西山经》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不寿者八百岁。龙鱼陵居，在北，状如狸。在汪野北，其为鱼也如狸。汪氏国在西海外，此国足龙鱼也。”^①也暗示“轩辕”在传说时代是中原至“西海外”“穷山之际”在交通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卓越的圣王。^②

《文献通考》卷二六〇《封建考一·上古至周封建之制》继黄帝事迹后说帝舜“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又写道：“按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召会征讨之事，见于《史记·黄帝纪》，巡守朝觐之事见于《虞书·舜典》，故摭其所纪以为事始。”^③则以为黄帝“召会征讨之事”与帝舜“巡守朝觐之事”有类同之处。

二、帝舜“巡狩”传说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述，帝尧“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之名望与权威的形成，与“彤车乘白马”的交通形式有关。^④他选用帝舜作为执政权力的继承人，首先注意到他的交通能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⑤所谓“使舜入山林川泽”，“入于大麓”，直接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交通能力的测试。所谓“山林”，司马贞《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穀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与此不同。”^⑥显然《穀梁传》和《史记》的理解是正确的，而“孔氏”“以麓训录”，“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之说不可信从。据《抱朴子·登涉》，抱朴子曰：“大华之下，白骨狼藉。”言行走山林，其境险恶。“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即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刺伤，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217页。

^② 王子今：《轩辕传说与早期交通的发展》，王俊义：《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炎黄春秋》增刊2001年9月），《黄陵文典·黄帝研究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59页。

^④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页。

^⑤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8页。

^⑥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页。

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这些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诸多因素，使得“古中国人把无论远近的出行认为一桩不寻常的事”。他们“对于过分新奇过分不习见的事物和地方，每生恐惧之心”。在他们看来，“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虫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风狂雨，烈日严霜，社稷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远人”。^①在原始时代，对种种阻碍交通的“神灵”“患害”的克服，可以为当时社会“以为圣”，甚至被看作具有“足授天下”的资质，是符合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实际的。

在帝尧在位期间，已经令帝舜主持行政。而执政的重要方式，是交通行为“巡狩”：“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②关于“巡狩”的具体形式，《五帝本纪》有所记述：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侯，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裴骃《集解》：“郑玄曰：‘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③也就是说，“巡狩”与“来朝”，是“天子”与“诸侯”自“京师”与“方岳之下”彼此交替的交通行为。对于“巡狩”四方的意义，张守节《正义》说：“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巡狩”，是一种政治交通实践，通过这样的交通行为，使天下四方真正可以归为一统。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以及“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于是“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的记载，是执行“天子”行政使命的程序性操作模式。《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又说：“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④大致此“二十八年”间，推行着“五岁

^①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56页。

^②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页。

^③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7页。

^④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38页。

一巡狩，群后四朝”的制度。

帝舜的“巡狩”是有直接成效的。《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①“巡狩”而“行视……”，促成了影响“天下”“下民”生存安危的重大决策。

帝舜的生命竟然结束于“巡狩”途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②

三、“禹行”九州，“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传说中接受帝舜的委命“续鲧之业”的“鲧子禹”，治水大业的成功，与辛劳奔走的交通实践联系在一起。《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櫓。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国家经济管理与行政控制的交通规划也因此成就：“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③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早期国家的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格局的形成，是以交通地理知识为基础的。

前引“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这一“行”的举动，《史记》卷二《夏本纪》引《禹贡》这样记述了其路线：“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沇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④据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四奥既居”，“四方之宅已可居

^①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页。

^②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页。

^③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④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2、54—56、58、60—65、67、69、75页。